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

史记叙事研究

司马迁

○毛金霞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

毛金霞 著

史记叙事研究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记叙事研究/毛金霞著.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10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

ISBN 7-5419-9675-0

I. 史... II. 毛... III. 史记—叙述—研究
IV. 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88406号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

史记叙事研究

毛金霞 著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长安南路181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创维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50×1168 1/32
印 张 12.25
插 页 2
字 数 270千字
版 次 200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19-9675-0/K·86
定 价 24.50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厂址: 西安太白南路规划路2号 电话: (029)88231355

序 言

董继昌

中国有世界文化名人司马迁，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陕西乃司马迁的故里，这更是陕西人民的光荣。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三秦研究司马迁的学者们组织起来，于1992年成立了“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开展有计划的群体性研究，这在司马迁研究史上是从未有过的。研究会成立后，研究工作迅速铺开，到现在为止，大型工程《史记研究集成》（汇校汇注汇评）已全面展开，1998年底十二本纪部分已全部完稿，大型电视专题片《司马迁万里行》已拍竣六集，大型丛书“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第一批书目（11种）已于1995年8月“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前出版，第二批即将于今年8月以后陆续出版。对这些可喜的成绩，我感到十分欣慰和由衷的高兴！这里仅就“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说几句话。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主旨是从《史记》是百科全书这一广阔领域内揭示司马迁与中华文化的密切关系，论述司马迁对华夏文化的贡献，他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其内容包罗天、地、人、物等系统知识。

过去，人们通常赞美司马迁是位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或以“史圣”誉之，但这都不足以全面体现司马迁在中国文

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郭沫若先生曾以“功业追尼父”称颂，认为是孔子之后的另一位文化巨匠，这是一点不假的。事实上，司马迁本来就是以继承孔子而自许的。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正是为了不辱父命，继承孔子伟业，司马迁便坚定地肩负起效法孔子著《春秋》而写《史记》的崇高使命。对于《春秋》，司马迁不单单看作是一部“史”书，而视之为“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文成数万，其指万千”，旨意高远、内容丰富的纲领性的文化经典。他的《太史公书》亦绝非一般“记言”“记行”的史官之举措，而是在“轴史记石室金匱之书”的基础上，要写成“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而这“一家之言”，不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补六艺之不足，还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较之《春秋》，其内容要丰富宏伟的多，且具有明显的突破性和超越性。

司马迁以孔子之后的文化领袖自许，决心写出胜过《春秋》的《史记》，这并非狂言欺世。论《史记》的成就，不管从中国历史长期已行的实践性，或从集文化之大成的广博性和从领风气之先的进步性哪一个方面而言，较之前人都是后来居上之佼佼者。如以实践而论，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行之有效的外儒内法的政体，并非是孔子思想的体现，实则以司马迁崇儒而不弃法的思想所构建；上层文化领域内百家竞流的实际，也非孔子一家的独行，而是司马迁“整齐百家”的再现。论其文化知识面的广博，李长之先生誉司马迁为“百科全书”式

的人物，其巨著《史记》当然也就是“百科全书”类的宝藏了。《史记》除了囊括孔子所致力于的诗、书、礼、乐之外，又融汇了百家学说于一炉，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民族、民俗，特别还有天文、地理、医学、科技等；而且并非停留于孔子“述而不作”的整理介绍阶段，力求作到“通古今之变”的论述，让人们“原始察终”充分认识其历史源流的发展变化。论其文化思想的进步性，且不必详列对各科文化的卓识远见，仅就政治上不提倡“克己复礼”，而在总结“承敝通变”的基础上大力颂扬革新进步；经济上不重本抑末，而提倡创造财富发展商品经济；在国家的统一上，不囿于“华夷之分”的狭隘圈子，而提倡华夏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的诸民族大一统的崇高思想；对外不是闭关自守，自我独尊，而是竭力介绍域外物产，让人放眼更广阔的天地。诸如这些思想认识，不仅在两千多年以前是十分杰出的、领先的，即使在两千多年以后的今天，亦是闪闪发光，仍具有相当生命力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司马迁是当之无愧的华夏文化巨人，其文化思想精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真正代表。

令人欣慰的是，丛书的组织者和编者，充分认识到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及其崇高地位，不再囿于史学、文学范围的研究，推而广泛，努力开拓新的领域，着眼于多层面全方位的探讨，丛书第一批 11 种选题涉及司马迁的一家言、创造思维、经济思想研究、民族思想阐释、教育思想述略、行年新考、司马迁与宗教神话、与今古文经学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研究会组织的第二批书稿，则进一步集中体现了《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的特点。这批书的研究领域扩展到司马迁与中国天文学、与中国地理、与中国农业、与中医药文化、与古代汉语语言、与编纂学、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等。这些课题的研

究，有不少是带有开创性的。华夏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但它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理论体系，这些在《史记》中都有充分的反映。

像本丛书这样全方位深化对司马迁的研究，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尤其富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充分探讨《史记》的丰富意蕴，总结三千年的人事盛衰存亡、成败得失的宝贵经验，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借鉴作用；科学评论司马迁的崇高精神及对文化的巨大贡献，让人们有为如此震古烁今的文化巨人而自豪，本身就具有产生爱国主义情操的强烈感染力；重视阐明司马迁对华夏文化的丰功伟绩及进步思想，既能使人们正确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也非常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丛书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收集的各家的论著，不强求观点的一致，这也体现了司马迁的治学精神。学术研究要发展，不可能没有争议，更何况对司马迁展开全方位的研究，确属开创性的事业，更需要各抒己见，互相争鸣。

司马迁竭尽毕生精力所撰写的《史记》，总结了中华三千多年的古代文明，是第一部集华夏文化大成的百科全书，其博大精深的內容，需要集中更多人的智慧，花更多的精力来不断研究。因此，我热切希望更多的学者和海内外热爱华夏文化的仁人志士，投身于司马迁的研究，为弘扬华夏文化做出贡献。也希望以此为契机，继续前进，把陕西逐步建设成司马迁研究基地。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为出版这套丛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充分体现了对积累民族文化的高度责任感，对此我表示敬意。

2000年5月写于西安

目 录

序 言	董继昌 [1]
引 言	[1]
一 叙事主旨	[7]
1. “究天人之际”	[8]
2. “通古今之变”	[21]
3. “成一家之言”	[32]
二 叙事时间	[53]
1. 叙事时距	[54]
2. 叙事时序	[61]
三 叙事结构	[72]
1. 外形结构	[75]
2. 纹理特征	[95]

四	叙事材料	[112]
1.	取材	[112]
2.	辨材	[125]
3.	选材	[131]
4.	组材	[146]
五	叙事立场	[151]
1.	三大阶层	[153]
2.	三方话语	[156]
3.	糅合立场	[166]
六	叙事视角	[173]
1.	全知视角	[174]
2.	限知视角	[184]
3.	多元视角	[188]
七	叙事艺术	[194]
1.	场面描写	[196]
2.	细节描写	[203]
3.	冲突设置	[211]
4.	“序事中寓论断法”	[223]
5.	对比衬托	[234]
八	叙事语言	[256]
1.	叙述语言	[257]
2.	人物语言	[262]

3. 议论语言	[281]
4. 修辞格	[296]
 九 叙事风格	 [317]
1. 抒情	[317]
2. 爱奇	[340]
3. 反差	[356]
 结 语	 [373]
主要参考书目	[377]
后 记	[381]

引言

近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心发生了由“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开拓出叙事学这个领域。叙事活动是人文精神进入大众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同时也具备了缔造时代精神、组织生活秩序的价值功能。

中国的叙事传统和叙事理论与传统史学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文史相通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一大特点。商代巫史共掌文化，至周代史官取代了巫的位置，成了文化的掌管者。史官的职责范围极广，《隋书·经籍志》曾概括为：“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于是，“史”成为古代的学术总汇。所谓“史官既立，经籍由是兴焉”，而史传

在文学领域也就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宋人真德秀“叙事起于史官”和清人章学诚“叙事实出史学”的观点，都表明要研究中国的叙事学，史书是绕不过去的。本书即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以位居“二十四史”榜首的《史记》文本为研究对象，剖析《史记》中典型的叙事型作品所蕴涵的叙事学元素，以期对《史记》叙事研究作一次梳理和开掘，并为其他叙事作品的解析提供一条思路。

我们首先从语源学与语义学的角度对“叙事”这个词进行追本溯源的探讨。“叙事”这个词早在先秦就出现了。那时的“叙”是用顺序的“序”字，主要是讲奏乐或丧葬仪式上的顺序，强调乐器的摆放和仪式的进行都必须井然有序。“序”跟空间的左右、时间的前后都有关系，只不过它最早的使用，不是在语言表述的领域，而是在中国非常看重的礼仪领域。根据《说文解字》的分析，“序”是“广”字头，“广”在古代指依着山崖所盖的房子，把堂屋上面的墙叫“序”，堂屋下面的墙叫“壁”，可见“序”是指一堵分隔空间的墙。我们用语言文字来讲述故事，就是要把空间的分隔转换为时间的分隔，按顺序来排列。在古代，叙事的“叙”和顺序的“序”，头绪的“绪”都是相通的，就是说中国的叙事学又是“顺序学”，又是“头绪学”，是把空间的分隔换成时间的分隔，重新进行安排的一种学问。这是从语源学与语义学的角度，考察出“叙事”这个词语的意义的可能性。“叙事”这个词一直到了六朝的《文心雕龙》才出现，《文心雕龙》有两次提到过叙事，但它还不是作为一个关键词讨论的，而是用在碑文或哀词的文体风格的介绍上，这里的“叙事”是个动宾结构。真正名词化了的“叙事”这个词的出现，是在唐代刘知

几的《史通》里，他专门设了一章叫《叙事》：“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可见“叙事”专门作为一种叙事法是在唐朝出现的。而作为一种文类或文体，则是到了南宋时期。南宋朱熹的嫡传弟子真德秀的著作《文章正宗》，把文章分为四类：第一类叫“辞命”，即皇帝的诏令和大臣的奏章等官方文章；第二类叫“议论”，即诸子散文；第三类叫“叙事”，既包括历史的叙事，也包括散文的叙事诸如墓志铭里的叙事；第四类叫“诗赋”，是抒情的文体。这种四分法一直沿用到了明清时代，一些小说评点家如李卓吾、金圣叹、毛宗岗等人把叙事从历史叙事推广到了小说叙事和戏剧叙事。也就是说，到了17世纪的明清之际，中国的评点家就超越了史书、小说、历史等文体的具体界限，趋向于把叙事抽象为人类的一种重要智慧了。^①

接着我们简要地梳理一下中西方的叙事学理论。中国最早的叙事是和史学联系在一起的。请看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史”的解释：“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在《说文解字》中，“史”字和“事”字是放在同一个部首的，可见“史”和“事”在很早时就存在着渊源关系。真德秀在《文章正宗·纲目》中也表达了这一观点：

按叙事起于古史官，其体有二：有纪一代之始终者，《书》之《尧典》、《舜典》与《春秋》之经是也，后世本纪似之。有纪一事之始终者，《禹贡》、《武成》、《金縢》、《顾命》是也，后世志记之属似

^① 杨义：《中国叙事学的文化阐释》，载《广东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27～28页。

之。又有记一人之始终者，则先秦盖未之有，而昉于汉司马氏，后之碑志事状之属似之。今于《书》之诸篇与史之纪传，皆不复录，独取《左氏》、《史》、《汉》叙事之尤可喜者，与后世记序传志之典则简严者，以为作文之式。若夫有志于史笔者，当深求《春秋》大义而参之以迁、固诸书，非此所能该也。^①

由此可见，中国叙事学实际上体现在两个系列之中，一者为理论系列，即历代文学、史学评论等典籍中讲述的叙事理论；一者为作品系列或曰形象系列，即历代流传下来的各种不同文体、不同体例的史学、文学著作，其中所体现出的种种叙事法则形态，构成了一部潜在的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国叙事学，自然要二者并重。而“叙事理论”只是一个借用的说法，中国古代并没有系统成熟的叙事理论。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叙事学传入中国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当时侧重于翻译介绍，九十年代之后，才进入研究与运用的时期，是一种前沿理论。

叙事形式的探索有文学自身的必要性。在如何解读叙事作品方面，中西叙事理论采用了不同的途径，中国的叙事文论重主体的审美经验，将叙事文本看成是社会心理和审美心理的载体，包含着重直觉、重诗化的中国智慧；西方叙事学则重审美客体的分析，以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作为逻辑出发点，将叙事看成是语言的文本。它们各自发现了文本的不同的性质侧面，但

^① [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见傅云龙编选：《宋人文集》第四卷第2498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从更高的层面上看，文本是人的本体的全面展开，语言和心理都体现了人的本体存在。因此，我们可以从人的本体存在出发，将西方的语言美学与东方的体验美学沟通起来，建构一个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当代叙事学理论体系。

杨义先生对中国当代叙事学理论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指出中国叙事作品形成了“技与道的双构性思维”，“它们以结构之技呼应着结构之道，以结构之形暗示着结构之神，或者说它们的结构的本身也是带有双构性的，以显层的技巧结构蕴涵着深层的哲理结构，反过来又以深层的哲理结构贯通着显层的技巧性结构。”^①如《金瓶梅》中“一宅二寺院”的潜隐结构给日常生活的描述蒙上了一层宗教和命运的色彩；《西游记》中“九九八十一难”的设置与古代中国的原始信仰和方术思想有着深刻的联系，贯穿全书的神秘数字更暗示着一种深层意蕴。

最后我们聚焦在本书的研究对象上，司马迁写《史记》的著述理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言”，根据《辞源》上的解释，它的第一性是动词（“说”以及“如何说”），第二性才是名词（“说的内容”）。“成一家之言”除了“言什么”而外，还有“怎么言”的意思，它本身就包括说的方法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怎么说”比“说什么”重要。结合这一思路来理解司马迁的著述理想，在探究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的问题上，他要创立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认识论），并且还必须有一个独到的方法（方法论）。

^① 杨义：《中国叙事学·结构篇》第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相对前代史书而言，他不仅要在“言”的内容上做出新的思考，而且要在“言”的方法上做出新的变革。传统不仅没有死去，而且还可能蕴藏着至今尚未被我们意识到的活力。因此我们不但要探测出司马迁独特的思想体系，更要寻找出阐述这一思想体系的具体方法。本书将结合中西方的叙事学理论，对《史记》的文本作一剖析。

叙事主旨

叙事的动力来源于一种需要，而需要又与其目的有关。叙事而成的客体文本，起源于叙事者的主观构想，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为何而写。叙事是一种特殊的“生产”^①，生产总是有目的性的，因而欲探究《史记》这一伟大著作的叙事形式，应从司马迁的叙事主旨开始。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著史事业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是研究司马迁叙事主旨的直接依据，而《史记》的文本是对其叙事主旨的具体演绎。《报任

^① [俄] 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家》，见胡经之等编：《西方 20 世纪文论选》第四卷第 24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